

关山远

关于脱贫攻坚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特别是不能忘了老区。革命老区为什么穷？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不仅仅只是地理因素，为了新中国的建立，老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直接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比如，青壮年人口的“断代性”牺牲。

且看当年红军长征后的苏区命运，这是一段让今天的中国人脱帽肃立致敬的历史。

一

首先讲一讲王进臣的故事。《六安红军与长征》一书，有一段王进臣的口述史，非常传奇，堪称一部大片，浓缩了红军长征后苏区的残酷、反抗与温暖。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西进开辟了川陕根据地；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从安徽金寨县突围，在河南罗山县集结开始长征，他们成为继当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瑞金后的第二支长征队伍。跟中央苏区一样，大别山也有部分红军队伍留了下来，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他们一直坚持到抗战爆发。

王进臣是安徽舒城胡家老庄人，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留下来在老家的地下交通站从事秘密工作。有个故事，各种反转，惊心动魄：某天，游击队负责人来交通站找王进臣，被反动保长的密探打听到了，马上去报告给了保长，保长连夜布置到密探交通站。殊不知，保长家里的帮工，是地下交通站的耳目，消息传出来后，地下党决定先下手为强。这天晚上，保长到前保长家里打麻将，前保长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人，他用上厕所的时间把消息传出来，游击队遂把前保长家团团围住，并从外到里撒下五道岗哨，保长因势不妙，立马逃命，他的逃命能力不弱，一口气逃过三道岗，在第四道岗的时候，毙命。

更传奇的故事，是王进臣三进安菜山。1934年初冬，他受命到舒城安菜山与驻守在那里的红八十二师建立联系。莽莽大别山，天寒地冻，王进臣扮作到山里收购木炭的小贩，在路上，先是碰到国民党的二十五路军，接下来又碰上国民党十一路军，都是对大别山苏区进行“清剿”的部队，他小心避开，一直走到第三天，才到达安菜山，但是，红八十二师不久前已撤离了。

怎么办？王进臣决心完成任务，找当地的地下党组织打听红军下落。他从炭贩子变身成为收山货的商客，借宿在一个姓冯的老奶奶家里，每天走村串户，寻找地下党组织，但一无所获。后来才知道：在白色恐怖下，安菜山党组织在春季就停止了活动。王进臣正愁眉不展时，危险降临：由国民党十一路军和地方民团组成的“清剿团”来了，见到陌生人就抓，冯奶奶很善良，对红军也有感情，隐约猜出

本报记者孙丽萍、许晓青

2019年4月28日，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闭幕之夜。86岁的何占豪、84岁的陈钢、79岁的俞丽拿一起登上东方艺术中心舞台，在如潮的掌声里，接过组委会特别颁发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首演60周年特别荣誉奖。

三位“80后”的脸上笑容荡漾，似乎青春依旧。而被他们率先奏响的这支小提琴协奏曲却已经“翩跹”了一个甲子。这只琴弦上的“中国蝴蝶”，代表着中国人从古至今忠贞不渝的爱情，飞过了沧海、飞向了永恒，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符号，更将成为全人类共享的艺术经典。今年11月，伴随音乐剧场《真爱·梁祝》的诞生，经典《梁祝》或将续写新篇。

六十年前的跨界融合

1959年5月27日，《梁祝》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正式首演。19岁的俞丽拿担纲小提琴独奏，樊承武指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管弦乐队协奏。

许多年后，作为《梁祝》的首演者和最权威的演绎者之一，俞丽拿曾反复回忆“传奇”诞生的那个瞬间：“演奏完最后一个音符，台下声音都没有。当时，我心里想，完了完了。但是就在这时，台下轰然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观众们都站了起来热烈地鼓掌，不停地鼓掌……我们都明白过来，《梁祝》这下真的成功了！”

演出结束，而掌声如黄浦江水澎湃、无休无止。指挥樊承武干脆大手一挥：“再来一遍！”于是，俞丽拿噙噙眼眶回舞

了王进臣的身份，便把他藏到了一个山洞里。山洞很隐蔽，安全没问题，但吃饭是大问题，前两天，冯奶奶还送点玉米粳粑来，但后来再也不见她来了。

饥寒交迫的王进臣陷入了绝境，他偶然发现洞外两只松鼠路过，于是跟踪过去，在一堆刺蓬下面，居然发现了一棵杨桃树，上面还残余了不少杨桃。这堆果实，让他熬过了大雪封山的日子。下山后，他去找冯奶奶，才发现冯奶奶的两间草房，已被“清剿队”烧掉，冯奶奶也遇难了。他继续打听红军消息，获知一些信息后，又化身收购鹅毛的小贩，翻山涉河，偶遇了一个和尚，原来是老家的旧相识，因为参加农协“染红”，红军长征后逃离家乡，在钝庵庵“出家”了。和尚告诉王进臣：他的师傅、安菜山香炉庵的冯老和尚，对山里情况很熟悉。王进臣返回地下交通站，把相关情况做了汇报。

几个月后的春天，王进臣再次奉命到安菜山继续打听红军下落。这次化身朝山拜佛的香客，来到了香炉庵，见到了冯老和尚，但后者也不知道红军去向。王进臣正懊丧间，冯老和尚提供了新的信息：有个叫“三姑娘”的，可能是红军的人。在佛殿，王进臣见到了“三姑娘”，一个双眼明亮的年轻女子，但“三姑娘”很谨慎。在她出庵下山后，王进臣跟上去，撞出了接头暗号，终于接上头了！但“三姑娘”说：红八十二师离开安菜山后，她也在队伍……

王进臣再一次到安菜山，是1935年秋天，他受命去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发展游击武装，建立根据地。他和“三姑娘”并肩战斗，把包括冯老和尚在内的多人发展成为党员，活动地点就是香炉庵。在支部成立大会的最后，“三姑娘”压低嗓子，给大家唱了《八月桂花香》和《红军到金寨》等歌曲，然后大家摸黑下山。游击武装很快组建起来了，处决反动保长，打得“清剿队”晚上只敢龟缩在碉堡里，惊叹说：“三姑娘”是来无影去无踪的妖精！”

抗战爆发后，王进臣参加了新四军。

二

万永达是湖北麻城一个穷人家的女儿，小小年纪就给人当童养媳，1928年，她21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当上了苏乡维埃主席。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大别山后，她留下来做地下工作，成为敌人抓捕的对象。《麻城县志》记载：1933年10月，有8个月身孕的万永达被清乡团围困在万字山，三天三夜水米未沾，经上山砍樵的老百姓多方掩护脱离虎口。

她还是牺牲了：1934年1月16日，腊月初二，潜回家中生孩子的万永达，因叛徒告密被捕。敌人破门而入前，她匆忙把一份地下党员名单锁进藏好，敌人没有搜出名单，当着她面摔死了她的孩子，又把她捆在树上，残忍杀害。乡亲们将她埋葬在附近山上。上世纪70年代，人们将万永达的遗骸迁到烈士墓，才发现遗骨中，竟然夹杂着一把生锈的小铜

匙——被捕前，她紧急把钥匙吞了下去……

万永达是麻城12538名登记在册烈士中的一个，更多的人，没有留下姓名来。据当地统计：麻城共有76300人先后参加了红军，有7260余人参加了长征，有14.3万人死难，其中相当数量，死于红军长征之后国民党军队与地方民团对苏区残酷的“清剿”。

今天再读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与各个苏区遭受“清剿”的史料，有椎心泣血之感，那真是用鲜血浸泡的黑暗一页，也是国民党历史上极其不光彩的一幕。

蒋介石要求对江西苏区“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烧”，国民党军的《剿匪报告》中如是写道，“清剿区”内，“剿匪之地，百物荡尽，一望荒凉；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阡陌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

蒋介石要求对江西苏区“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烧”，国民党军的《剿匪报告》中如是写道，“清剿区”内，“剿匪之地，百物荡尽，一望荒凉；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阡陌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

蒋介石要求对江西苏区“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烧”，国民党军的《剿匪报告》中如是写道，“清剿区”内，“剿匪之地，百物荡尽，一望荒凉；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阡陌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陕甘宁边区采访，当来自湖北大悟县的徐海东告诉他，自己家族有66人被害，其中近亲27人，远亲39人，埃德加·斯诺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失声问：“什么？”徐海东告诉他：是的，66人。

徐海东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当地人一度不敢姓徐。1949年10月，徐海东自己掏钱，在家乡湖北大悟新城镇江冲村建起了“徐海东亲属烈士墓”，有其伯父徐有义、四哥徐元海、五哥徐元波，堂兄徐元大、元洪、元典、元兴、元庆，侄儿徐文初、文治、文阶、文庭、文明、文雄、少东等人。

此时，家乡已经没有跟徐海东同辈的老人了……

三

1935年4月26日，在江西瑞金红林山的黄田坑村中，一小队红军被国民党军包围，掩护战士后撤的指挥官右腿、左腿先后中弹，双腿跪地，向潮水般涌上来的敌人不断射击，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国民党军获悉他的身份后，欣喜若狂：他是毛泽覃，毛泽东的弟弟，时任红军独立师师长，时年30岁。

一年之后的1936年5月14日，又一位红军将领陨落在大别山：时任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政委方永乐。令人敬慕的是，牺牲前，方永乐刚被错误打成“第三党”，被解除职务下了枪。当他们在河南商城与湖北麻城界处的雾露塘地区与敌人猝然相遇时，方永乐习惯性地又开始指挥战斗，他要回了枪和望远镜，带领部队从上午九时一直打到下午三时，掩护主力撤退，激战中，他被敌人狙击手击中胸部，旋即牺牲。

许多年后，方永乐当年的部下，已经成为新中国的将军，他们谈起方永乐来，热泪长流：他牺牲时年仅20岁，没有结婚，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人们只能比照他弟弟的模样，给他画了一张素描……

毛泽覃、方永乐，都是牺牲在南方八

省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中的高级干部，这期间先后牺牲的烈士名单，很长，很长：项英、何叔衡、瞿秋白、刘伯坚、贺昌、阮啸仙、毛泽覃、万永诚、李赐凡、李天柱……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堪称中国共产党党史、军史上最为艰难的三年时间。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写道：“长征时留在江西的人中间，牺牲的杰出共产党人比任何其他斗争时期都要多。”他把这些没有参加长征、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的红军部队称为“死亡军团”。

在敌人残酷的封锁与围捕之下，红军游击队只能隐藏在深山老林中，风餐露宿，这里住一夜，那里过一宿，有时一天要换几个地方，常常与死亡擦肩而过。1944年，陈毅在延安向美国观察组外交官谢韦思介绍南方游击战争时说：“我们像野兽一样地生活。”

他在《赣南游击词》中这样描述：“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三更长……”

在《赣南游击词》中，陈毅还写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这是真情实感。如果没有人民支持，这三年南方游击战争，怎么可能坚持下来？

敌人采取各种办法，封山封坑、移民并村，想阻断红军与群众的联系，但群众利用初一、十五开禁日上山打柴的机会，带些粮食、盐、咸鱼和报纸、情报，在深山里到处去，让游击队去拾。靠近大山的村子，敌人来搜山搜村时，群众就在山内山外、村内村外、墙头、树梢、窗口等地方做暗号，游击队看到这些暗号就及时避开了……

读红军长征后苏区的历史，有一个细节，尤为令人动容：一些红军重伤员不能随主力部队长征，分散在各个野战医院，缺血少药，处境艰难。苏区群众听说后，纷纷跑到医院，没儿子的认领儿子，没女儿的认女婿，背的背，驮的驮，抬的抬，接到各自家中……他们的儿子、女婿，踏上了长征路，或者，已经牺牲在保卫苏区的战斗中。这些红军伤员，就是他们的儿子、女婿。

今天，在江西革命老区，还能听到经典歌曲《十送红军》。歌声哀婉而又激越，铭记着伟大长征，铭记着生离死别，铭记着人心向背。

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晚开始至20日晚，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从于都县城的东门渡口、南门渡口、西门搭脚下水口、梓山镇的山峰坝渡口、罗坳镇的孟口

渡口、鲤鱼渡口、石尾渡口、靖石乡的渔翁埠渡口先后渡过于都河，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于都河沿岸群众卸掉自家门板，甚至拆掉给老人准备的棺木，协助红军在近70华里的河段上，仅用不到4天时间，就突击架起5座临时浮桥。为了不被人发现的侦察机发现目标，军民们每天下午4时开始架桥，晚上8时架桥供部队过河，次日凌晨再拆除，不留任何痕迹。5个渡口的浮桥反复拆搭足有15次之多，堪称奇迹！

红军长征后，多少父老乡亲在等待他们回来，尤其是一些丈夫踏上漫漫长征路的青年妇女，苦苦等了一生，却不知道她们的丈夫，已经倒在长征路上……这样的“盼夫”故事，坚贞的爱情守望者，让今人泪眼婆娑。

在鄂豫皖根据地，红军长征后，当地也流传着一首歌谣《盼红军》：自从来了“刮民党”，劳动人民遭了殃，奸淫烧杀抓壮丁，无数穷人把命丧。白天盼太阳，夜晚盼月亮，盼望红军快回业，工农群众得解放。

今天读这些文字，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当年的苏区群众，为了支持红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送子送婿参军，处贫瘠之地，却竭尽财力支撑红军前线作战，“最后一碗米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红军，中国共产党，到底有什么“魔力”？

这个答案，很长很长，如果一言以蔽之：红军，中国共产党，视革命理想大于天，要为中国人创造一个新中国。

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主动放弃延安，胡宗南部占领延安，一时大加吹嘘，为应付记者采访，甚至安排一人扮演被俘的共产党旅长。彩排时，胡宗南很不满意，亲自教这个演员：一定要口声生硬说成“刮民党”。令他懊丧的是，即使给延安老百姓钱财，但延安人照样不说共产党坏话，最耐人寻味的是蒋介石的延安之行，当年8月7日，蒋介石乘着美龄号专机飞临延安，翌日，在大群侍卫们严密保护下，来到枣园毛泽东居住过的窑洞前，看到一架纺线的纺车，问：毛泽东要这东西做什么？胡宗南回答：大军围困，延安物质匮乏，毛泽东亲自纺纱。

历史的答案，其实就在这架纺车上。

五

1948年4月22日，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1949年8月23日，第四野战军解放瑞金。

2018年7月29日，瑞金市正式脱贫摘帽，退出贫困市序列。2019年5月7日，延安的贫困县全部摘帽，从此告别绝对贫困。

因为今天，历史回溯如此生动。因为历史，今天我们充满自信。

和84岁的陈钢分别带来了新作——二胡协奏曲《英雄泪·蝶恋花》与交响诗《情殇——霓裳飘逸歌贵妃》。

何占豪的二胡协奏曲《英雄泪·蝶恋花》哀婉动人。“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毛泽东的诗词《蝶恋花》，化作二胡与交响的悲伤对话。

陈钢的《情殇》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昆曲与交响乐中西合璧、以《长恨歌》《长生殿》故事为蓝本、激情澎湃的旋律表现荡气回肠的爱情……种种相似元素，令人依然可以感受到《梁祝》的气质十分吻合。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一念一生”、生死不渝的真爱情怀在中国人心中永远珍贵。”俞丽拿认为，爱情是中国文学长河中永恒的主题之一，小提琴曲《梁祝》擅用神话故事中的浪漫主义与章回结构元素是其魅力核心。而新作则希望将这份中国情爱从“鸳鸯小爱”推向“家国大爱”。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已经成为中国式爱情的代名词，而怎样的爱情才能代表中国人的隐忍和大义？我们希望通过这部作品歌颂的中国之爱，既有生死相依的不离不弃，也有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家国合一……”该剧导演徐俊表示。

《梁祝》作者们仍在创新

回望《梁祝》，一转眼就是六十年。在写《梁祝》时虽然正当青春，但似乎并不觉年少；而在现今也没有老去之感。”上海之春的闭幕式中，86岁的何占豪

本报记者冯源 李坤晟、唐致

这个故事离现在已经差不多有五百年了。明嘉靖六年(1527年)，夏历八月初的一个晚上，夜色渐深，初秋的天气凉爽起来，半个月亮斜斜地倚靠在西边地平线的上空。

访客散尽，即将远赴广西的王守仁听说两位弟子钱德洪和王畿不在庭前等候，就带着他们走到了南门外的碧霞池天泉桥上。听穷学生的问题，阳明先生高兴地说：“正要二君有此一问(我正等着两位同学问我)！”

今天的碧霞池上已无天泉桥。盛夏之际，站在普普通通四四方方的小池塘前，洋洋上冒出三朵洁白的幼荷，让人无限遐想。

那天晚上，钱王二人的问题，围绕着阳明先生的四句教海——“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而展开。师生的问答则在后世被称作“天泉证道”，有如经典的镜头，留存在中国思想史上。

可惜的是，昔日的新建伯府，如今只剩钦贤亭、石门框、观象台等少数遗存。后人只能靠碧霞池里发现的明代纪年的茶盅、酒盅、瓷碗、瓷盘，推测王阳明及王门弟子“设席于碧霞池上……酒半酣，歌声渐动”时的碧霞池景。

“致良知”“知行合一”“心即理”……近年来，随着日益兴起的传统文化热潮，各种阳明心学的概念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使用，《传习录》成为不少人的案头书。

只是今天纪念王阳明，绝非仅仅为了膜拜一位古代圣贤。在绍兴举行的第三届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上，阳明心学如何启迪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引发热议。

“近五百年来，儒家的源头活水就在王阳明，未来，阳明心学会更深刻地影响中国乃至东亚的思想发展和社会变迁。”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院长董平说。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廖亦庆看来，阳明心学蕴含着关于世道人心的深邃洞见。其“致良知”的思想便是告诉人们在内心自我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只有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才能对客观世界有充分的了解。

“关于王阳明的前期思想，像知行合一”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甚至致良知”，大家都讲得很多。我比较关注他的晚期思想——万物一体。”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教授表示，王阳明“万物一体”的晚期思想平衡了他中期思想的过分内在化倾向，强调了外在的亲民实践。

王阳明于明武宗正德元年，因反对宦官刘瑾，滴贬至贵州龙场(贵州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当驿丞。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

在龙场这既安静又困难的环境里，王阳明结合历年来的遭遇，日夜反省。一天半夜里，他忽然有了顿悟，认为心是感应万事万物的根本，由此提出心即理的命题。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圣人之道是什么，就是良知，良知人人都有。判断事情对错是非，标准是良知，而不是外在的一些事物。

“阳明心学抽象，属于哲学范畴，社会治理具体表象属于社会范畴。但这两者却有真正密切的关联。”绍兴诸暨市市长王芬祥说，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实现个人“致良知”是最为重要的前提。“致良知”便是高度认可社会规范，和谐稳定的社会治理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

明正德五年，38岁的王阳明升任庐陵县令。初次任地方官，王阳明意气风发，以当时政府官员的角度看，在民风彪悍的庐陵县当父母官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这也是王阳明一身功业的开端。

“安托清愚百姓，请上级宽免贡赋；改变当地好讼之风；改善疫病流行状况；严禁公差打秋风”；推出保甲制度御盗；调遣钱粮征收兑运流程；动员全部的街坊百姓进地让民众防火，降低火灾风险；调解军民户关系；恢复里正”三老”，受理民事纠纷。监督判举官员。”军科院战争研究院中国历代军事思想研究室主任王珏列举了王阳明在江西庐陵(今吉安)当县令时的九大善政，“所谓的理想社会治理，要官与民作为平等的社会成员，共同培育人向善的社会环境。”

“王阳明曾说，必须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绍兴市委书记马卫光认为，传承弘扬阳明文化，就要在做好一项一项具体工作中不断提高自我、弥补短板，担起应尽的责任，作出应有的作为，努力推动各项事业朝着正确方向不断发展。

穿越五百年的阳明心学

这个故事离现在已经差不多有五百年了。明嘉靖六年(1527年)，夏历八月初的一个晚上，夜色渐深，初秋的天气凉爽起来，半个月亮斜斜地倚靠在西边地平线的上空。

访客散尽，即将远赴广西的王守仁听说两位弟子钱德洪和王畿不在庭前等候，就带着他们走到了南门外的碧霞池天泉桥上。听穷学生的问题，阳明先生高兴地说：“正要二君有此一问(我正等着两位同学问我)！”

今天的碧霞池上已无天泉桥。盛夏之际，站在普普通通四四方方的小池塘前，洋洋上冒出三朵洁白的幼荷，让人无限遐想。

那天晚上，钱王二人的问题，围绕着阳明先生的四句教海——“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而展开。师生的问答则在后世被称作“天泉证道”，有如经典的镜头，留存在中国思想史上。

可惜的是，昔日的新建伯府，如今只剩钦贤亭、石门框、观象台等少数遗存。后人只能靠碧霞池里发现的明代纪年的茶盅、酒盅、瓷碗、瓷盘，推测王阳明及王门弟子“设席于碧霞池上……酒半酣，歌声渐动”时的碧霞池景。

“致良知”“知行合一”“心即理”……近年来，随着日益兴起的传统文化热潮，各种阳明心学的概念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使用，《传习录》成为不少人的案头书。

只是今天纪念王阳明，绝非仅仅为了膜拜一位古代圣贤。在绍兴举行的第三届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上，阳明心学如何启迪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引发热议。

“近五百年来，儒家的源头活水就在王阳明，未来，阳明心学会更深刻地影响中国乃至东亚的思想发展和社会变迁。”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院长董平说。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廖亦庆看来，阳明心学蕴含着关于世道人心的深邃洞见。其“致良知”的思想便是告诉人们在内心自我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只有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才能对客观世界有充分的了解。

“关于王阳明的前期思想，像知行合一”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甚至致良知”，大家都讲得很多。我比较关注他的晚期思想——万物一体。”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教授表示，王阳明“万物一体”的晚期思想平衡了他中期思想的过分内在化倾向，强调了外在的亲民实践。

王阳明于明武宗正德元年，因反对宦官刘瑾，滴贬至贵州龙场(贵州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当驿丞。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

在龙场这既安静又困难的环境里，王阳明结合历年来的遭遇，日夜反省。一天半夜里，他忽然有了顿悟，认为心是感应万事万物的根本，由此提出心即理的命题。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圣人之道是什么，就是良知，良知人人都有。判断事情对错是非，标准是良知，而不是外在的一些事物。

“阳明心学抽象，属于哲学范畴，社会治理具体表象属于社会范畴。但这两者却有真正密切的关联。”绍兴诸暨市市长王芬祥说，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实现个人“致良知”是最为重要的前提。“致良知”便是高度认可社会规范，和谐稳定的社会治理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

明正德五年，38岁的王阳明升任庐陵县令。初次任地方官，王阳明意气风发，以当时政府官员的角度看，在民风彪悍的庐陵县当父母官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这也是王阳明一身功业的开端。

“安托清愚百姓，请上级宽免贡赋；改变当地好讼之风；改善疫病流行状况；严禁公差打秋风”；推出保甲制度御盗；调遣钱粮征收兑运流程；动员全部的街坊百姓进地让民众防火，降低火灾风险；调解军民户关系；恢复里正”三老”，受理民事纠纷。监督判举官员。”军科院战争研究院中国历代军事思想研究室主任王珏列举了王阳明在江西庐陵(今吉安)当县令时的九大善政，“所谓的理想社会治理，要官与民作为平等的社会成员，共同培育人向善的社会环境。”

“王阳明曾说，必须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绍兴市委书记马卫光认为，传承弘扬阳明文化，就要在做好一项一项具体工作中不断提高自我、弥补短板，担起应尽的责任，作出应有的作为，努力推动各项事业朝着正确方向不断发展。